

## 《香港廿二春——師奶列傳》 ——紀錄片作為研究方法的反思<sup>1</sup>

何式凝

本期的「視覺文本」，是何式凝教授「廿二春——香港婦女研究」項目的另一次文字/影像的對話及詮釋。作者闡述研究背景，並反思紀錄片作為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可靠性及被訪者的主體性；而九張的紀錄片影像輯錄，則展開平凡女性對婚姻、愛情、生活的多重詮釋及論述。

---

何式凝，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研究興趣：性別政治、性文化、社會運動及質量研究。電郵：[psyho@hkucc.hku.hk](mailto:psyho@hkucc.hku.hk)

---

Text Image

## Audio Visual Documentary as a Research Tool —A Methodological Reconsideration

Sik Ying HO

---

### Abstract

This issue of Text Image introduces Professor Ho's project on featuring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middle aged women in Hong Kong. By embedding the researcher's own subjec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narration, Ho reflects on the issues of validity, trustworthiness and informants' subjectivity when audio visual documentation is involved as a methodological articulation.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Ho, S. Y. (2012). Audio Visual Documentary as a Research Tool—A Methodological Reconsider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9, 217–230.

Sik Ying H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interests: gender politics, sexuality, social movements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 《師奶列傳》的創作背景

2007年，我的人生中的出現了兩個問號：何時「出碟」和跟誰旅行。

所謂出碟是個譬喻，意思是把自己喜歡的創作結集成一件作品，將之面世。其實「出碟」的最大意義，是投入創作和勇於發表的那份能量。一個人必須要很在狀態，有心有力，才可「出碟」。2007年，我為了保存那份幹勁與熱情，決定放下工作，用一年時間去做好這張「碟」。

當時我獲邀出席東京 I-HOUSE 舉行的「亞洲領袖學人計劃」。在東京交流期間，我同時開始了我的「出碟」大計。這次我想寫關於自己的文章。

寫作在東京進行尚算順利，可是「亞洲領袖學人計劃」將完結時，我還未完成這個作業。那時我想，我必須出發去另一個地方——讓我把這件事完成的地方。I-HOUSE 的圖書館其實是每個寫作人夢寐以求的地方。但我感覺自己必須繼續上路，證明自己有本事孤身走我路，而不是死守圖書館。後來我才漸漸清楚，所謂「必須」，其實是我對自己的要求。單身的個體好像無法擺脫這種自設的「挑戰」——正因為身邊沒有旅伴，久不久就出走一趟，而且出走的姿態必須非常漂亮不可，藉此給自己也給世界知道：可以的，一個人也可以很好。

於是我踏上了另一個旅程，出發前往北海道。

### 意外

在日本，寂寞是加倍的。也許因為冷漠的日本人；也許我已過了一個人也可以逍遙自在的年紀。

在札幌八天寫滿一百頁後，我已經無法再忍受那份寂寞，決定回去，到東京跟我的男友會合。

訂了回東京的夜班火車，我想像自己將在移動的車廂中檢視我的自傳，我的人生，並以為這會是個又淒美又浪漫的旅程。如果我人生的旅途注定只有我一個，我希望那會像一趟火車旅程。儘管這不是我的終極理想，但這是我依然可以擁有的，一段淒美浪漫的旅程。

但我回程的經歷，不僅完全與想像不符，更把我一直對人生旅程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9期(2012)

的設想摔得粉碎——我在火車站附近的雪地上摔到了，整個手腕已經跌斷，脫白的手掌與手腕，看上去像是完全無關連的兩截。

坐在地上無法站起來，於是扯破喉嚨大聲喊，並不知道用日語求救是無人理會的。不知過了很久，終於有個巴士站的職員來扶我。又等了很久，救護車終於到來，把我送到醫院。

這次意外後我開始真切體會真切的恐懼，對死亡的恐懼。跌一跤，人生就不在一樣。儘管死亡真正來臨時未必如此，可是對死亡的想像，徘徊死亡邊緣的回憶，讓我益發害怕。而最大的恐懼是，死亡不知何時出現。

### 療傷的日子

就像任何的人生危機，事發時往往不是最痛苦的，往後漫長的療傷期才是真正難熬。

手術後我回家住了幾個月，洗澡、梳頭、飲食等日常活動由媽媽和妹妹照顧。

覆診的時候由我不同的男性友人陪伴。我不願一個人去覆診，因為我不願意獨自面對那個極度男性化的醫療制度，不願意一個人去作那些突如其來的決定(如又要入院，再做手術等)。我發現原來人生中最重要伴侶關係是，一個可以陪我去看醫生的人，如果他是男人便更好。

我努力以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康復間的各種起伏。然而傷口一直不消腫，好像永遠也無法復原，心裏難免憂慮。即便如此，我沒有到處訴苦，讓終日為我奔波的家人加重負擔。終於無法忍受這樣每天花大半天更衣吃飯看病的生活，我決定如期展開「第二春」的研究項目，並為那個依然存在的問號尋找答案：下半生有誰陪我去旅行？

由於殘障無法書寫，我更下定決心尋找另一些表達方式。我選擇了我從未嘗試的方式進行研究——拍攝紀錄片。



## 中年女性的第二春——師奶作為研究對象

延伸自「第二春」研究計劃，我希望拍攝一些40歲至60歲的女人的故事，藉此瞭解香港女人對愛情、家庭、婚姻、性的看法和感受。

以前我研究同性戀，很多人認為同性戀很「酷兒」(Queer)。其實每種身份、每個人都有酷兒的性質，當中包括「正常」的人。於是我從社會最正常的群體——師奶——出發。假如最正常的人都有奇特的一面，不正常/正常的界線也就不存在。

對社會界線作出提問，是社會工作的基要任務。我們常以為自己站在草根和邊緣社群的立場，他們以為自己沒有偏見，實質上卻背負很多價值判斷。把正常群體的「特異性」呈現，就是對社會界線提出質問、懷疑。

同時，我亦希望探討女性的生活經驗，看看她們如何在生活中跨越界線。我希望透過影片，表揚這些女性改變社會規範的貢獻。表揚社會上知名的成功女性如陳方安生、葉劉淑儀並不是社會工作的首要任務，但是表揚普通女性的一生，讓我們看到她們堅毅的精神和創造生活空間的力量，並從中學習，這件事是很社會工作的。

## 紀錄片開啟的可能性

### 紀錄片作為研究方法

相較錄音機，攝錄機更能帶出事物不同層次的意義。攝錄機逼使研究者打開感官，留意聲音以外的各種線索，發現新的資料。例如《師奶俠侶》(Of Women, Dogs and Ai [Love])中的林女士，我第一次見她時，抱着狗隻來。我事先沒有想過探討女人與寵物的關係。但是，之後她帶我跟我的研究助理莫頌靈到大牌檔，因為她說其他地方都不准狗隻進入。在大牌檔時，她非常細心的把菜的外部 and 油膩的部分咬去，然後把中間的部份餵給狗兒。我立即請莫拍下來。假如我只以錄音機訪問，這些線索都會被忽略。攝錄機亦可以捕捉很多聲音和文字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9期(2012)

不能紀錄的細節，這些細節往往可以揭示事物的另一些特質。即使那些特質不是研究議題的精要和核心部分，但它們讓你看見事物的不規則性和多層面向。層次越多，事物的怪異性越強；怪異性越強，思辯的可能性亦越高。

另外，攝錄機可在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張力產生張力。很多人認為，攝錄機的可見性可能妨礙了受訪對象揭露自己的事情。但是攝錄機也有確認人生種種痛苦絕望的功能，它可以使受訪者發一些只有攝錄機在場時才會說的話。例如在另一套影片《父女心經》中，片中的爸爸因為結識內地女子，離開了香港的妻兒子女。在訪問時，他把他的想法說出來。假如沒有攝錄機，他不一定會在女兒面前揭露他面對兩個家庭的內心感受。攝錄機確認了他的自白。當然，每一個媒介都會同時開啟及抑制某些可能性，完美的媒介是不存在的。但攝錄機創造了一種環境，然後我用的我的訪問技巧，幫助受訪對象把他們的經驗、歷史呈現出來。

### 紀錄片與學術文章的互動

我的紀錄片都是在第一次接觸受訪者時拍攝的，而不是看了資料搜集後再製作，這是我的影片最獨特的地方。我用攝錄機，捕捉讓我詫異的事物，特別是與一個陌生人初次相遇的火花。

剪接的過程，其實跟寫學術文章差不多，一樣是以概念出發，然後找主題，分章節，目的也是講一個引發共鳴的故事。

我認為紀錄片跟學術文章可以互相生成。我希望一個故事可以有不同面向的真實，聲音、影像、文字都可以是展示事物不同的面向。但是，有些學術概念的思考是不能以影像的方式去表達，它必須透過語言去傳遞。於是我們只可以不同的方式去呈現研究主題及主體，讓更多人理解事物的多重意義。始終，我也不願意放棄學術的遊戲，書寫學術文章讓我更認真地去思考研究問題；學術文章嚴格的評核機制，也逼使你把問題說得更清楚。

## 學術與社區的對話

質量研究是社會科學中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而質量方法強調的就是有效性(Validity)、可靠性(trustworthiness)。在學術文章中，研究對象大多以一個編號或隱名的身份出現，他們所謂發聲的空間十分有限。紀錄片則給予主體在鏡頭下用他們的聲音、表情表達自己的機會，它與質量研究強調的可靠性吻合。我在播放紀錄片時，也會邀請受訪者參加，他們可以自由發表意見，這樣受訪主體才有真正發聲的權利，和跟學者對話的空間。

而且，我會選擇在學院以外如科學館、創意書院等場地播映，讓更多人有機會接觸影片。在香港，我們可以聽見女性談自己婚姻、情慾的機會不多。假如有觀眾因為這些紀錄片而變改他們對女性的想法，這個社會就可默默產生變化。對女性而言，這些影片更為她們提供參照及其他人生的可能性。例如，《萬福瑪利亞》的故事，讓我們知道單身女性可以領養孩子。大部分香港人都不知道這是可以的。觀眾看了影片後，這件事就不再怪異，也就是我所說的把正常/異常的界線打破。

總括來說，紀錄片作為社會科學研究可以打開多重對話：第一是影像與學術文字的對話，第二是學術和社群的對話，第三是研究者與受訪者的對話以致關係的改寫。以紀錄片作為研究方法，是一個知識民主化的過程。

社會對女人、情感、愛慾有很多論述，而這一系列的紀錄片所呈現和創造的，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詮釋。我和被訪者為着拍攝，一起冒險投入新嘗試，一起創造。在很多的傾訴與聆聽之中，我們互相認識、諒解，同時給予對方支持和力量。

在中年的迷惘和危機中，我們向彼此獻出嘗試改變自己的意願。至少我相信，《廿二春——師奶列傳》開闢了新的論述、讓女人、情感、愛慾豁出了社會既有想像的框框。

《傳播與社會學刊》· (總) 第 19 期 (2012)

## 《香港女二春——師奶列傳》



《愛媽媽悲媽媽》(ab Mother)

《廿二春》的受訪者



《愛是恆久忍耐》(Love Endures All Things)

雖然丈夫認識有第三者，她選擇不離婚而是鬥愛他，誰人更愛他誰就贏。



《愛媽媽悲媽媽》(ab Mother)

一個因為第三者而導致離婚的女人，後來成為另一個家庭的第三者。  
她的故事，讓我們明白現代女性越界的可能在於道德勇氣。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9期(2012)



《愛夢呢喃》(Love In a Dream)

她心裏面有一個夢中情人，這個情人是人是鬼是真是假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給予女人愛的能量。



《萬福瑪利亞》(Virgin Mary)

領養兒童的單身母親的故事。單身女人也可以成為母親。



《施比受更為有福》(Giving Is Better Than Receiving)

她捐了一個肝給丈夫。她不認為自己偉大，她只是沒有選擇的餘地，並慶幸自己能夠施予。



《師奶俠侶》(Of Women, Dogs and Ai [Love])

你看見女人與她們的狗兒的相處時，就知道女人可以是這樣的萬種柔情。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9期(2012)



《彈弓手》(Trigger Finger)

她苦心服侍身邊的人，最後卻變成了彈弓手。她讓我們看見傳統道德背後的另一面真實。



《哈囉 Mimi》(Hello Mimi)

Mimi，56歲時接受變性手術，她/他的故事清楚的對「女性是甚麼」作出了根本的提問。



## 註釋

1. 文章結合編輯訪談及何式凝的《一個女人在途上》而成。訪問、整理、統稿：周佩霞。

## 本文引用格式

何式凝(2012)。〈《香港廿二春——師奶列傳》——紀錄片作為研究方法的反思〉。《傳播與社會學刊》，第19期，頁217-230。

